

19.01.

清远县党史资料丛书之四

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

清远县农民运动

中共清远县委党史办编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 清远农民运动综述

郭宝通

二十世纪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展现出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革命的崭新面貌。一九二四年一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使工农群众运动在革命策源地——广东蓬勃开展。随后，持续十八个月、震惊世界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和风起云涌弥漫全国、冲击数千年封建统治的农民运动，发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揭开中国现代革命历史新的一页。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在清远广大农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农民运动，这是在全国、全省革命形势的带动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清远农民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纳入全省农运范畴。它打开了清远人民革命的新局面，唤醒大多数在“沉睡”中的劳苦大众奋起，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发展迅速，影响深远，震撼和动摇清远地方的封建统治，冲击和破坏数千年来的传统习惯势力，显示出觉醒起来的人民的无穷力量，焕发新一代的革命青春。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清远农民选派优秀子弟，组成北上农军，参加南昌起义，汇入工农革命洪流；广州起义前夕，清远农民进行攻城暴动，以之策应和支援。这些都为清远的革命历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清远农民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清远县有两千多年历史，地处广东中部、北江中下游，京广铁路南段，南邻广州，北接韶关，是省内南北水陆交通枢纽，粤北山区的南大门，沿海与内地的接壤地带。境内有山地、丘陵和平原，人民世代以耕种为业，千百年来历受封建压制剥削，近世以来，更遭到西方列强之侵袭，农村小农经济濒于解体。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并未能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局面；民国成立之后，军阀连年混战，加上水、旱灾害频仍，天灾人祸，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动荡不安。一九二四年，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高举革命旗帜，号召各地致力国民革命，宣言反帝反封建，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大力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广东人民热烈响应，地方军阀封建势力挣扎顽抗，变本加厉地对人民掠夺和压榨。在清远，官绅豪劣相互勾结，霸占民田，人民忍无可忍，爆发了石板乡农民抢割骚动事件，成了清远农民运动的导火线。

一九二三年，清远地方的土豪劣绅，假借孙中山大元帅府“清理广州市内善产庙田以筹集北伐军费”的通令，大肆掠夺兼并、假公肥私。附城乡局董及县城绅士讼棍等，以大德堂名义，勾结县署官产处，冒称捐助军饷，承领了广州玄妙观在清远附城石板的庙田三百八十亩，将之出租和发卖，这些田地，原为石板村农民世代开垦耕种的业田，他们的祖先为了避免地方豪劣的欺压，将之投靠道教玄妙观取得其保护，农民保留享有永佃权，每年仅需向玄妙观缴交低微的“地沙租”。但大德堂承领该田后，拒不维持石板农民的永佃权

及历史租额，任意将之发卖或按时值升租，声言原耕者若不重订租约则退耕驱赶。石板农民不甘其赖以生存的良田被掠夺，群起反对。大德堂有官绅撑腰，强制执行，首先将村前农田十五亩，卖与外来人建寮耕种，其余田地勒令按时值升租，否则严究不贷。农民不服，酝酿对抗，但区、县均偏向业主，耕者无从申诉。至次年夏、秋间，石板农民被迫得走投无路，由钟扬德带领，到被霸夺之田地去抢割，闹事泄愤。据《石板村史》记述当时情状颇为激烈：“全村群众，不甘心祖辈从宋代年间披荆斩棘地开垦荒地劳苦得来之永佃权利，一旦被人夺去，被迫起来反抗，那时，钟扬德振臂一呼，全村男女齐集村前商量对策，议决各持镰刀、禾杠，到（被霸占的）田中将新业主朱并的禾全部刈回，在刈禾时，又将前来阻拦的朱河捆绑田中，以泄愤怒。”事发后，官绅联合镇压，迫害为首农民，治以聚众抢刈暴乱之罪。钟扬德等被迫逃亡躲避。

其时已是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已经召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已形成，在广东的革命政府积极扶植工农运动，革命空气弥漫全省。是年秋冬，钟扬德等辗转到达广州后，经律师孔庸的指点，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求援，主持农民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同志先后接见了石板乡农民代表，支持他们的反抗斗争，教育和鼓励他们回去发动农民组织起来，抗击封建劣绅的无理压迫，并发给“章程”，指导他们组织农民协会。几经筹备，得到农民部核准并发给钤印和犁头旗帜，是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清远县第一个劳苦农民的组织——石板乡农民协会建立起来了。农民部派农运特派员、共产党员宋华、赖彦芳两人到石板村指

导成立并进一步开展农运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十二月，中共广东区委、农委和青年团广东区委，派韦启瑞同志到清远建立党小组，发展党、团组织，主持全县农民运动工作。从此，清远人民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迈开了革命的新步伐。

石板乡农民协会的建立，把被压迫的农民组织起来，成功地抵制了大德堂的无理惊夺。消息传出，各地农民欢欣鼓舞，地主豪绅为之惊心侧目，尤其是向来被蔑视为“一脚牛屎”的农民，竟然胆敢与官绅对抗，并能取得胜利，充分显示了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广大农民认识到农民协会在政治上有合法地位，能够支持农民理直气壮地抗击地富豪劣的封建压迫，捍卫农民正当利益。影响所及，各地受压制的农民都闻风而动，要求组织农会，在党小组和清远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的领导下，农运特派员和地方积极分子做好宣传发动和指导工作，各地农民协会纷纷建立起来，并有计划地逐步发展区、县组织，把全县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和谋求自身的解放。

清远县农民运动，以石板农民抢刈骚动事件为契机，星星之火、漫燃全县，成为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揭开了清远人民革命斗争的序幕。

二、清远农民运动的三个发展阶段。

清远县农民运动，从石板村农民斗争开始，如出峡之洪流、一泻千里，汹涌澎湃，遍及全县，发动起劳苦大众反抗黑暗压制，追求光明进步，给人民带来时代的新思潮，在启

迪人民政治上的觉醒、提高革命斗争认识、组织工农群众联合各阶层进步人士、投入国民革命运动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从一九二四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运动按其工作重点和发展态势，可分为“组织发展”、“武装自卫”和“艰苦斗争”三个阶段，现分述如下：

第一阶段——组织发展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六年三月）

石板农会的建立，标志着清远农民运动的开端，中共广东区委和由共产党人主持工作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出中央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县指导运动。最初到达石板协助成立农会的，有农讲所第二届学员、共产党员赖彦芳、宋华两人，接着，农讲所第一届学员、共产党员韦启瑞奉派来清远主持全县农运工作。

运动初期，主要致力于农民运动的宣传和区、乡基层农民协会的普遍建立，一九二五年初，先在县城公开建立了清连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以指导和组织全县的农民运动，然后，以石板农会为基点，通过全面宣传发动，启发农民自愿，逐步建立起庙仔岗、上黄塘等乡农会，把运动推广至清东、清西以及浜、琶各地。为了充实和健全各地农会组织，县农协筹备处举办农干训练班，培训出一批地方农运骨干，同时选送优秀农干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四期学习，提高地方农干素质，为建立县、区、乡三级农民协会充实干部力量。

在乡农会基本普及的地区，发展建立区一级协会，一九

二五年三月，清远县第二区（附城）农民协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中央农民部代表颁发旗帜印铃，国民党清远县长也亲到会场致词，宣示政府支持农民运动的宗旨，仪式之隆重，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九二五年五月，全县农民派代表钟耀龙等六人出席参加广东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钟耀龙被选为省农民协会候补执委。一九二六年初，清远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所属区农协三个，乡农协一百二十二个，会员九千五百八十七名（引自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报告）。按当时习惯，农民一般是每户家长报名参加农会，代表其全家各人，所以实际参加农会活动的已超过数万人。（一九二六年二月广州《民国日报》记载：“清远县农民协会统率农民三万余人。”）形成空前大规模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各地农会成立后，均按照章程组织起农民自卫军，守望相助、保卫农民运动顺利进行，进一步推动清远国民革命运动进入高潮。

在建立各级农民协会工作中，发展和加强党团组织建设是重要的一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来县工作的特派员中的共产党员已成立党小组，韦启瑞任组长，这是清远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韦启瑞也是团广东区委委员，到清远后，按照上级党委指示，对运动中涌现的优秀农干和青年进行培养，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吸收其中优秀分子参加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先后发展党员十一人，团员二十三人。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建立起党支部和团特别支部，韦启瑞兼任党、团支部书记，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清远农运的领导。与此同时，全县工、青、妇、学等群众组织运动，在党、团支部发动下蓬勃开展，使古老县城掀起一派革命新气象。

农民协会的建立，推动农民解放运动向前发展，这一期

间，清远人民进行反封建斗争，在我党组织的积极支持下，以农民协会名义，公开进行农民革命运动，取得振奋人心的胜利。

（一）、开展减租运动：各地农会成立后，按照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所通过“农村实行减租，按原租额减百分之二十五”的条例，发动和支持农民进行减租斗争。上黄塘村农民首先对大河塘的官产田实行“二五减租”。县政府立即支持并首先执行。以此为先例，各地农民纷纷开展减租运动。太平沙公坳地主勾结民团头目刘卓、李葵等，持势抗拒执行，六区农协组织农民与之进行说理斗争，附近各农协也发动群众前来支援，顽固地主理屈词穷，自感势孤力弱，被迫低头认错，奉行减租法令。这是清远县农民在反封建的经济斗争中首次取得的胜利，部分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待遇，得到群众的欢迎。

（二）、争取民主权益：县农民协会积极争取农民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通过宣传贯彻“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据理力争，得到国民党县长的支持，县内执行“联席会议”制度，全县工、农、商、学、妇各界代表参加，（当时的联席会议主席团主席为县农协执行委员长黄俊廉。）使人民团体能与县政府对话讲理，据《清远县志》（卷三）记述：“县长廖百芳与农民分庭抗礼……当时邑中联席会议，农会、工团为主，商、学会、民团局备数而已！农会发有反对共产即反革命之标语”。清远农民运动的开展，使劳苦大众和人民团体有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在社会活动中有一定的发言权，大大提高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和信心。

（三）、打击土豪劣绅：农民运动的兴起，动摇了地主

豪绅的封建统治，引起地方顽固势力的对抗。合安乡豪绅林超凡，无理阻挠该乡建立农民协会，农民不服，到县申诉，在县农协筹备处的支持下，县署将林超凡治以破坏农民运动之罪，判处入狱一年，寿田乡劣绅何鼎煌，持有清代庠生之名位，霸占族产、鱼肉乡民，当地农民组织起农民协会，清算其贪污账目，将之捆绑游街，送县署执法监禁。三坑糖业公司，“捐棍”温茂犹，私设税卡，勒收糖捐，农民不服，争论中冲突起来，“捐棍”被殴毙，事发后，县署查究，县农协向县长申述实情，平息事故，并取消了这项苛捐杂税。清远县农民组织起来、打击不法土劣，严惩作恶豪绅，镇压反动嚣张气焰，使农民革命运动顺利地向前发展。

（四）援助省港大罢工：一九二五年六月爆发了省港大罢工，省农协发表宣言，通电声援工人的反帝正义斗争。清远县农协筹备处积极响应，配合县罢工团进行反帝宣传和禁售仇货等活动，发动起全县各界人民，举行援助罢工纪念周，集合上万群众开会声讨帝国主义，捐款支援罢工工人。会后，派出代表携同锦旗、慰问信以及捐款（良毫）伍百元，亲赴省罢工委员会慰问和致敬，表现了清远农民支援和关怀阶级兄弟的革命情怀。在前，清远农协筹备处响应省农协的号召，组织农民运输队二百余人随军支前，帮助平定“刘、杨叛乱。”清远农民积极参加全省和全国的革命运动，进一步把农民革命运动汇入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洪流。

清远农民运动的组织发展阶段表明，农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摆脱了过去那种分散、落后和无能为力的状况，焕发出有组织、有办法、振作有为的青春活力，运动从经济上的反抗转变为政治上的斗争，从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地位

进而参与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行列，这使清远农民运动在质方面有了飞跃的升华。同时，清远县农民协会密切配合罢工团行动，带动进步的民众团体——各行业的工会、小商人的商民协会、青年学生界的新学生社、妇女界的妇女解放协会等共同工作，抵制反动顽固势力，推动社会进步，初步建立起革命民众大联合的统一战线，为下一步把革命运动推上高潮打下了基础。但是，由于主观客观的因素，清远农民运动发展初期还比较幼稚，不可避免地出现缺点和弱点。正如老同志回忆录中指出：“当时上级党委批评：你县群众组织一日千里，党团发展赶不上指导群众的需要。”“由于党内工作同志应付不暇，农会准许其自动组织，虽有章程，无人讲解，会员对权利义务不大明白，因而组织松散，出现无组织、无纪律行动，被敌人利用，损失很大。”这一些，在以后运动发展中都逐步得到解决和克服。

第二阶段——武装自卫

（一九二六年四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

清远农民运动的兴起，使全县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广大农民意气风发。有力地触动了封建势力的代表——地主豪绅。他们看不惯往昔鄙贱之“耕仔”造反，特别是农会的惩治土劣和减租运动，直接触及其阶级利益。他们既不甘心，也预感到覆亡的危险，地方上反动顽固势力相互勾结，图谋反扑。同时，因孙中山逝世和廖仲凯被刺后，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势力逐渐抬头，他们背离“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纵容所属大搞阴谋活动。在清远，原粤军团长

刘东在**县内豪绅地霸**的支持下，凭借其旧上司广东民团统率处主任李福林的委派，成立清远民团局，任为总团长。委派李达纲等地方豪绅为局董，不顾县署和各界的反对和制止，将各处保卫团、巡防队等地方封建武装拼凑成**县民团联防队**，并改编潘伯良等土匪豪强以壮大其力量。民团成立后，地方封建势力又复嚣张。

一九二六年四月，韦启瑞调职离县，中共广东区委、农委派叶文龙负责清远农运工作，任党团书记。叶到任后，即召开党团员和区、乡农协委员会议，传达区党委指示，商讨全县工作的开展。按照党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精神，要从各方面帮助广东政府北伐，但从广东政治局势来看，国民党内部动荡不定，为了防止右派势力破坏工农运动，必须争取国民党左派，团结各界进步人士，打击反动势力。同时要充实和训练农民自卫军，加强武装自卫力量，预防形势逆转。根据清远的现实情况，县农协开展了下列几方面工作：

1、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一九二六年初，正式成立清远县农民协会，五月，县农协选派代表出席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参加全省农运大检阅，交流经验，按照大会决议，提高各级农会组织活动能力，扩大发展。会议结束后仅仅三个月内，县内又发展乡农协二十三个，会员一千三百五十三人（户）（引自罗绮园在省农协执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会务报告）。使组织面达全县乡村的过半，县、区、乡农协组织也得到健全和提高，把清远农民运动推上新的高潮。

2、发展革命民众大联合，打击反动顽固势力。同年五月一日，县党组织发动全县工、农、商、青、妇、学各界召开

“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各乡农协也组织农民进城参加，加强革命群众组织大团结。对于反动顽固派扶植民团的活动，县农协组织各界人士取得县署的支持，先后通电全省，揭露劣绅非法利用公款扶植民团，制止了各乡民团局擅抽田亩捐的不法行为，据理力争，使省团务委员会下令撤销非法成立的太平乡民团局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复辟活动。

3、积极训练，加强农民自卫武装建设。清远的农民自卫军按照农协章程于农运初期组成，以乡为单位，挑选青壮年会员参加，平日在本地服役（不脱产），区以上设常备队，由县农协分批轮训，随着运动进入高潮，县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和人员日益充实，在维持农村治安、保卫农民运动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自卫武装的素质和战斗力，县农协组建农民自卫军模范大队，挑选各地农军战士一百二十名参加训练，派出骨干到广州学习军事，呈请省派来军事干部、黄埔军校学生到县协助编练和担任指挥职务。县农军模范大队驻扎在城郊瑞峰书院，分批轮训各区、乡农军常备队伍，加强军事化编练，提高地方农军战斗力，保卫革命，防范反动派捣乱。

一九二六年夏秋两季，清远农民运动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地方封建顽固势力垂死挣扎，急不及待地策划武装镇压，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率先动手，唆使反动民团向农军挑衅，制造事端，进行大屠杀。

是年冬，周田乡民团小队长苏子朋，率队到农军防区麻字田牛行骚扰侵袭，咄咄逼人，黄獠座苏森部农军忍无可忍，与之发生冲突，混战中，周田乡民团局董王观水被击

毙，县民团局借口报仇，气势汹汹地包围和开枪扫射县农会，发兵攻打黄獠座农军，并在农村全面发难。反动民团头目刘东、李达纲、潘伯良等，纠集琶江、三水等地土匪近千名，先后攻打石板、上黄塘、庙仔岗等乡农协。焚掠村庄，残杀农民干部，并乘机攻袭太平、山塘等集镇。团匪兽性大发，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特别是山塘之役，新任县长胡少翰和各界代表亲到山塘圩召集冲突双方进行调解，在会议中，民团突然发起袭击，农军不备，伤亡甚大，造成惨案。据当时调查，在多次双方冲突中：农军和农民被杀害一百七十多名，被烧房屋四百多间，被抢耕牛七百多头，被劫财物八十多万元，其他损失难以统计。民团的滔天罪行，令人发指。

清远农民面临浩劫，尤其是民团拼凑的反动武装，人多势众，兽性凶残，而各地农民自卫军组织分散，武器不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农民协会组织农军坚决反抗反动封建势力的残暴镇压。他们英勇战斗，设防守险，给来犯敌人予以杀伤，黄獠座农军只有十多人，坚守炮楼力抗数百团匪围攻；太平被围农军，顽强坚持两日三夜才突围撤出。县农军模范大队虽初经编练，兵员不多，勉力肩负重责，指挥调度全县农军，组织抗敌，屡出奇兵，驰援各处，多次主动出击牵制敌军，救出被围农友。副大队长赖松柏率十八名勇士与黄獠座农军内外夹攻，击溃数百名团匪，其英勇胆色，使敌人恐惧心惊；山塘之战，是民团发动对农军的突然袭击，制造了有名“山塘惨案”，省派来的军事干部、共产党员黄刚奋以及农军指战员共四十八人为掩护会议代表和农军主力安全撤离，英勇战斗而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这种英勇献身精神，历

久仍为人们所传颂。最后，全县农军配合省派来的防军，在县城和三坑等地，打垮民团主力，平定了团匪暴乱，取得了武装自卫和反抗封建镇压的胜利。

上述事件之发生，各地震动，省农民协会通电全省，声讨不法民团，要求政府檄调军队平乱保民；同时函电慰勉清远农民，支持他们英勇斗争。中共广东区委农委罗绮园同志亲自向有关部门申诉交涉，促使省政府电令驻韶关的第三军教导师派防军二营，到清远弹压民团暴乱，在全省人民支持下，省防军到县与农军配合，击溃民团主力，驱散其残余，维护地方安宁。县署会同各界成立“团匪摧残农民善后委员会”，清算民团罪恶，缉捕团匪首恶，抚恤被害农民家属，恢复农村生产等。

一九二七年三月，县农协和“善后委员会”在县城召开“殉难烈士追悼大会”，将山塘战役牺牲的烈士遗骸四十八具，移葬北门松树岗，举行公葬仪式。各乡农民均进城参加，会后举行万人示威游行，高呼口号，严厉警告一切破坏工农运动的顽固分子，显示了革命人民团结的力量。

反动派武装镇压工农运动的阴谋破产，清远农民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群众革命信心更加坚定，年轻的农军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清远农民运动走上全盛时期。只是由于前期对农民武装的编练抓得较迟，武装自卫力量未能发挥，在受到团匪袭击中农民遭受较大损失；以后，因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我们党内出现右倾机会主义，形势起了急剧逆转，农民运动进入艰苦斗争的低潮时期。

第三阶段——艰苦奋斗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抵定东南各省，以共产党员为核心主力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主力，被誉为铁军，威震中原。工农群众运动汹涌澎湃，席卷大半个中国，反动残余胆战心惊。正当国共合作领导人民大众的国民革命取得节节胜利之时，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势力狼狈为奸，勾结国民党内右派分子，从革命阵营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反动野心家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阴谋策划，要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施行高压手段，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的反动分子率先响应，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事件。工农运动被迫转入秘密活动，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共广东区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指示各地组织应变，建立工农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共清远县党团书记叶文龙，在县城召开全县党团员及农协干部扩大会议，贯彻广东区委紧急会议精神，同时来县指导应变工作的还有上级领导同志周其鉴、赵自选等。会议传达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右派已背叛人民，广州的反动派封闭罢工委员会和省农协，捕杀工农革命群众，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被害。因此，上级布置各地工农运动转入地下，保存实力，以待时机。同时，上级电令清远农军调派精锐主力，集结韶关，执行任务。会议成立“清远县非常时期特别委员会”，主持应变工作。

“非常特委”经过研究决定：精选基干武装二百八十人，组织清远农军大队，由叶文龙任总指挥，率队北上韶

关，县内工作，任命温锦成为县党团代理书记，安排全县农协骨干的隐蔽工作。建立石梨塘、秦皇山、良盎均等秘密军事据点，加强对全县农军的联系，潜伏待命。另由县农协党支部书记刘清建立秘密联络站，接应上级和外来同志，沟通内外联系，并负责在铁路沿线及河岸渡口组织破坏小组，准备策应军事行动。

会议结束后，清远北上农军齐集县城，为避免走漏消息，拆除了城楼上的电报机，截断县内外通讯。北上农军于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开拔，过后岗、入横石，渡河乘火车北上英德、韶关，与北江各县农军会师。县党团组织留守干部及时通令各乡，布署隐蔽转移，已暴露的农会骨干潜伏山区或疏散外地，各区、乡农协停止公开活动，干部带领群众相互掩护，密切防范反动派寻仇报复。

是年五月，国民党的广东政治分会派北江宣抚委员会的李孔政等到清远执行“清党”，改组国民党县党部、县农协以及其他群众团体。这些反共人员逼走了当任县长，把持县政，缉捕共产党员；他们起用民团武装，给以“宣抚军”名号，任命刘东等头目为团长，借口清除“共匪”，到处搜捕。在革命高潮时逃走的地主豪绅纷纷还乡，各区、乡农民协会被取消，会员遭到迫害，农民和其他劳苦大众又回到了水深火热之中，人心惶恐，社会动荡不安。这时，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反动面目全面暴露，清远反动势力更加疯狂镇压人民，白色恐怖笼罩全县。

清远县农军大队奉命集结韶关后，会合北江各县北上农军，由省农协罗绮园同志统率，组成广东农军，以补充团番号退入湖南，北上武汉，几经曲折斗争，开到江西南昌，参加

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广东农军编入起义部队，随军转战，在会昌击败国民党钱大钧部，以后，又与沿途堵截和追击的敌军战斗，清远农军奋勇杀敌，干部、战士经历了革命锻炼和战斗考验，中队长赖松柏能攻善战，指挥有方，在十一军叶挺部升任营长，英勇战斗的赖德林，在瑞金火线入党，其他指战员均能在革命军队熔炉中锻炼成长，为工农革命武装斗争作出积极贡献。

随着起义部队到达汕头后，清远农军亦分别遣散回乡执行新的革命任务。十月中旬，从部队转移到香港的赖松柏同志，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他与周其鉴召集在港的清远六名党员开会，传达省委会议布置，策划回清远发动群众，重建工农革命武装，组织攻城暴动，策应广州武装起义的重大战略部署。他们在十一月回到清远，会见留守的党团员和农协干部温锦成、刘清等，秘密召开全县农运骨干会议，积极发动，具体组织，再燃工农武装革命烽火。

全县农军武装迅速集结，成立“清远工农革命军独立团，”赖松柏任团长，宋华任参谋，通过省农会领导人周其鉴的协助，刘清前往花县邀派农军武装一百六十人支援清远攻城暴动，清花两县农军合共四百多人，集结城郊葫芦岭，整装待命。

十二月三日，（农历十一月初十）清远人民举行武装暴动，农军除了派出一部分破坏铁路，以防敌军南下外，他们迅速攻入县城，占据中心要地，刘清率突击队进入县署，俘获县长陈守仁及其他官员，收缴县署印信及文书档案，革命斧镰红旗，飘扬县署上空，远近军民欢声雷动。这时，反动派组织反扑，敌县长在混乱中逃脱，急电省方请援，并召集